

歌德、路提里乌斯与奥维德

文/伊安·菲尔丁 译/康凯

当奥维德在两千年前于托弥去世时,这还不是流放文学。而在路提里乌斯的《归途》中可以看到则是流放文学从古代罗马开始向现代欧洲迁徙的第一步。而库尔提乌斯将歌德看成是这一迁徙运动的终结。让歌德的“世界作家”理念显得十分具有奥维德特色和古代晚期特色的并不是某种主张“同源于罗马”的倒退性理念,而是一种对流放、混杂和边缘的体验。

2017年10月将会是约翰·沃尔夫冈·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的《意大利旅行》(Italienische Reise)第二部分出版两百周年。这是一部回忆录,回忆了30年前,即从1786到1788年间歌德在意大利生活的岁月。回忆录的第二部分提及了他在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岛的旅行,一直叙述到他于1787年6月返回罗马为止。如前所述,这部作品出版于1817年,距离歌德后来在《第二次罗马停留》(Zweiter römischer Aufenthalt, 1829)中写完他在意大利最后10个月的故事还有12年。不过,在一份日期为1817年8月31日的日志中,他已经准备好了一份将成为此后作品结尾章节的草稿,其中描述了他获得召唤后离开罗马前往魏玛共和国的情况。歌德引用了奥维德在《哀怨集》1.3中描述自己离开罗马城前夜的几行诗句(见右对照版)。

这些诗歌的确在某些时刻出现在了歌德的脑海中。在1788年12月,当歌德在罗马晒黑的皮肤还没变白时,他在一封信里告诉他的朋友、哲学家和批评家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我无法从我内心抹去对这段岁月炽热的回忆。我无法告诉你我是用什么样的感情来不断背诵奥维德的诗句的。”在详细讨论这段文字前,先看看赫尔德的回答将会是十分有趣的。当他和歌德在1770年第一次相遇时,歌德曾经试图让他相信,奥维德的《变形记》是一部极其出色的作品,但这遭到了赫尔德坚定的反对:“这些诗歌中没有真实,或者是接近真实的内容”,这是赫尔德对奥维德的评价,记录在歌德的自传中:“这里既没有希腊,也没有意大利,既没有原始世界,也没有文明世界;相反,所有的一切都是对已有事物的模仿和对此类事物矫揉造作的呈现,这或许来自一个过于有教养的头脑。”这种对奥维德诗歌过于

Bei meinem Abschied aus Rom empfand ich Schmerzen einer eigenen Art. Diese Hauptstadt der Welt, deren Bürger man eine Zeitlang gewesen, ohne Hoffnung der Rückkehr zu verlassen, giebt ein Gefühl, das sich durch Worte nicht überliefern läßt. Niemand vermag es zu theilen als wer es empfunden. Ich wiederholte mir in diesem Augenblicke immer und immer Ovids Elegie, die er dichtete, als die Erinnerung eines ähnlichen Schicksals ihn bis ans Ende der bewohnten Welt verfolgte. Jene Distichen wälzen sich zwischen meinen Empfindungen immer auf und ab.

cum subit illius tristissima noctis imago,
quae mihi supremum tempus in urbe fuit,
cum repeto noctem, qua tot mihi cara reliqui,
labitur ex oculis nunc quoque gutta meis...
iamque quiescebant uoces hominumque canumque
lunaque nocturnos alta regebat equos.
hanc ego suspiciens et ab hac Capitolia cernens,
quae nostro frustra iuncta fuere Lari,
numina uicinis habitantia sedibus, inquam,
iamque oculis numquam templa uidenda meis.
(= Ov. Tr. 1.3.1-4, 27-32)

矫情的批评是18世纪知识分子圈中看低奥维德作品的代表性观点(就这一点来说,19世纪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也同样如此)。然而歌德始终对奥维德钦佩不已,他在信中引用奥维德,就好像要告诉赫尔德,奥维德的诗歌实际上是被一种与意大利和罗马之间的真挚关系所激发的。

对歌德来说,1788到1817年间所发生的事件可能对奥维德在《哀怨集》中所表现出的对罗马的怀念有着更为重大的意义。拿破仑在意大利的战役令歌德无法在1790年代后期回到那里,而拿破仑战争所引起的动荡直到1815年左右才告终。在维也纳和会重组欧洲秩序之后,那些德意志自由民族主义的倡导者们也不再试图去建立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国家——直到1871年,它仍然是一个松散的联邦。总的来说,歌德对民族主义运动怀着矛盾的感情。不过正如约翰·皮泽尔(John Pizer)所强调的那样,正是在政治动荡和分裂的背景下,歌

德才开始构思出他的“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的概念。他没有一个自己可以代言的国家,于是歌德如他自己所说,“越来越相信诗歌中拥有普遍的人性,无论何时何地,它都存在于成千上万的人中间”。这一著名的评论是在1827年做出的,由此来看,1817年出现在歌德旅行日志中的那个被放逐的奥维德或许可以被看作是歌德的“世界作家”(Weltautor)的原型。

换句话说,在这里,歌德将自己看成是罗马公民(ciuēs

在我离开罗马时,我感受到了一种不同寻常的痛苦。要离开这座世界的首都,我曾经长期作为它的一位公民所生活的地方,而且无望返回,这给了我一种无法用言辞描述的感觉。没人能够理解这种感觉,除非人们已经体会过这种离别。在那一刻,我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奥维德的哀歌,当对一种相同命运的记忆追随着他直到人类世界的尽头时,他创作了这些诗句,它们反复出现在我的思想中:

当我的脑海中浮现出那无比悲伤的夜晚,它给我带来的是我在这座城市中的最后一点时光;当我回忆起这个夜晚——我在那时遗留下了如此多挚爱的事物——我的眼里也会流下泪水。现在,人声和狗吠已经沉寂,高高在上的月亮女神正驾驭着她的骏马驰过夜空。抬头看着她,凝视着她照耀在卡皮托利山上的月光,这些光即便洒向我的家宅亦是徒劳。我说:“诸神就住在我的故乡附近,而我的眼睛却再也无法看到他们的神庙。”

Romani)中的一员,在“世界首都(Hauptstadt der Welt)”早已变成一个久远的记忆时,仍然遏制不住对它的思念(歌德在1829年的手稿中明显没有任何类似的评论,这些文字与初稿相比显得更加晦涩)。值得注意的是歌德在哀叹自己“被逐出”罗马时并没有引用的一些奥维德的诗行。其中包括《哀怨集》1.3.5-6(me discedere Caesar / finibus extremae iusserat Ausoniae; 凯撒命令我远离意大利的边界),奥维德在诗歌中说,根据奥古斯都的命

令,他不得不离开意大利。有人认歌德可能想在他的赞助人卡尔·奥古斯特(Karl August)公爵1828年去世后出版他意大利回忆录的最后一卷。这样就不至于冒犯这位公爵。因为歌德曾经在回忆录里暗示过,他被召回魏玛的时间比他所希望的时间要早。歌德也没有提到《哀怨集》1.3.25-26,在这里,奥维德将自己的家室和陷落的特洛伊相提并论(si licet exemplis in paruo grandibus uti, / haec facies Troiae, cum caperetur, erat)。这是奥维德诗歌中诸多的隐喻之一,它们对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进行了根本性置换,而歌德可能会称它们为英雄挽歌(heroisch-elegisch)。从罗马城的起源上来说,罗马的确是一座流亡者们的城市,是没有国家的人们的祖国。因此,即使在遥远的托弥,奥维德也不会被拒之于想象中的罗马共同体(此处借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名言)——这是一个在空间和时间上延伸到城市本身之外的共同体——之外。

通过歌德的旅行日志可以发现,没有迹象表明他曾经念及奥维德在公元17年去世的纪念日。歌德也不太可能意识到,在奥维德被放逐的几个世纪之后,曾经有一个诗人和罗马官员像他一样不情愿地离开罗马而返回自己的故乡。即使歌德读过路提里乌斯·纳玛提阿努斯(Rutilius Namatianus)的挽歌

(下转15版) ➔



1907年伦敦出版的路提里乌斯《归途》,其左页为科西嘉岛港湾风景。

